

地域转移、读者变更与晚明日用类书农桑知识的书写

杜新豪

(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北京 100190)

【摘要】晚明时期,书坊刊刻了多种日用类书售往民间,其间包含着丰富的农桑知识。文章详细探讨了晚明日用类书中农桑知识的分类、内容及其价值,通过将其与宋元时期日用类书中的农桑知识进行纵向对比,认为它们开创了一种新式农桑知识的书写模式。这种转变不仅是因为受到元代两本农书的深刻影响,而且与书写地域的转移和读者群体的变化有着莫大关系。

【关键词】晚明;日用类书;农桑;知识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0)04-0010-08

Region Transfer, Readership Change and the Writing of Agriculture & Sericulture Knowledge in Daily-use Books during Late Ming Dynasty

DU Xin-hao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Abstract: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bookstores published a variety of daily-use books sold to the people, which contained a wealth of knowledge about agriculture & sericulture. This paper discusses in detail the classification, content and value of agriculture & sericulture knowledge in daily-use book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By comparing it with the same knowledge in daily-use books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y have created a new writing model. This change is not only deeply affected by the two agricultural books of the Yuan Dynasty, but also has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riting area and the change of the readership.

Keywords: late Ming; daily-use books; agriculture & sericulture; knowledge

大约在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一种号称载有庶民百姓日常生活中诸类所需知识的通俗性书籍充斥于书肆并畅销于民间,这批类似于当今家庭生活百科全书的日用手册被学界称为日用类书。彼时编纂日用类书的书商及其雇佣文人经常在书籍的封面或序言中标榜其读者对象是“天下四民”,称其书为“四民便览”“四民利用”或“四民捷用”,古代四民之中,农居其二,故而农桑知识也是日用类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晚明日用类书编撰者的描述,这些从其他书籍中被汇聚起来的各类知识就像堆满书案的美玉,读者可根据其需要信手拈来、随时翻检、查阅与利用,具体到农业方面来说,读者们经由阅读日用类

【收稿日期】2020-03-2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青年项目“中国古代日用类书中的农业史料整理与研究”(19CZS076);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重大突破项目“科技知识的创造与传播”(Y921011018)

【作者简介】杜新豪(1987-),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农学史。

书中的相关农学知识,可以起到“农以之耕,知天时亦知地利”^①的作用。

但由于类书这种体裁书籍的特点就是对既往文献资料的承袭与汇总,大多遵循述而不作的传统,经常存在托伪、杜撰、重复、冗杂等诸类缺陷,故而历来被古人斥作“稗贩之学”“剽窃腐烂之书”“村塾兔园册之类”,受到士大夫和文人墨客的鄙夷与轻视。由于它的资料汇编性质,所以长久以来其作用仅被局限于辑录佚书与校勘古籍方面,如学者在元人编纂的日用类书《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以下简称《居家必用》)中发现了唐代王旻《山居要术》的部分残篇,从而填补了从《齐民要术》到《四时纂要》间的农书文献空白^②。具体到其中的各类日用知识而言,学者们普遍认为日用类书中所载的知识价值不大,研究建阳商业出版史的贾晋珠(Lucille Chia)就对日用类书中所载知识之陈旧进行过抨击,他认为:“就大多数建阳本的内容来看,我们很难通过翻阅它们来判断当时哲学和知识界的趋势,以及医学和技术上的新发展”^③。

日用类书中蕴含着丰富的农学知识,主要包括农桑、牧养、占候三个方面,其中的农桑知识被撰者单列为“农桑门”,之前鲜有学者关注到这部分内容,目前仅有的两篇论文也仅关注到其中的农业竹枝词部分^④,而竹枝词在其中仅仅是充当解读耕织图的辅助工具而已,“农桑门”中最重要且最有新意的部分应该是其中的文本知识。本文试图聚焦于晚明所刊日用类书中的农桑知识,对其中的知识内容进行详细叙述与分析,揭示出它的价值与意义,并对晚明日用类书中农桑知识的新式书写方式及其背后所蕴含的社会背景进行解读。

一、宋明时期日用类书中的农桑知识概述

现存最早的日用类书是南宋末年由陈元靓编纂的《事林广记》,书中就已经有关于农桑知识的专门章节,被称为“农桑类”,但惜乎原书已佚,目前仅能看到它的几个元代翻刻本,由于它们是在宋本基础上进行的递修,所以翻刻者根据元代新撰的《农桑辑要》《王桢农书》等农书对其中的多处内容进行了增补。该章首先是一段名为“农桑本务”的文字,从总体上叙述了农业生产的重要性;继而是三幅耕织图像;紧接着介绍了各种重要农作物的栽培及养蚕缫丝知识。此外,该书在“农桑类”之后还有“花果类”与“竹木类”两章来介绍花卉、果树和经济林木的种植技术。元代还有另外一本日用类书《居家必用》,该书以天干为纲分为甲至癸十集,“农桑类”在“戊集”中,主要包括种艺、种药、种菜、果木、花草、竹木这六类内容,其中有关大田作物的吉日或忌日即种艺吉凶占了很大篇幅,该章主要叙述了各种大田作物、药草、蔬菜、瓜果、竹木等栽培植物的耕作与栽培技术,在蚕桑方面则记载了栽桑与养蚕的各种具体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农桑类”中还包括“文房适用”“灯火备用”以及如何辨别金银、玉器、象牙等奢贵物品的“宝货辨疑”篇等无关农业生产的部分^⑤。

明代有一本名曰《多能鄙事》的日用类书,现存版本为嘉靖四十二年(1563)刊本,该书虽托伪是由明初的刘基所撰,但学者们皆认为不可信,卷首有嘉靖十九年(1540)青田县儒学训导程法撰写的序,可以肯定其成书于1540年之前。该书卷七名为“农圃类”,其内容大多抄袭自《居家必用》,其中的农学内容为作园篱法、种水果法、种药物法、种蔬菜法、种竹木花果法以及与畜牧兽医相关的牧养类知识等。与《居家必用》相比,该书的主要变化体现在水果与蔬菜篇中,撰者在水果类增加了有关莲藕、菱角、芡实等

① [明]武纬子:《新刊翰苑广记补订四民捷用学海群玉》序言,明熊冲宇种德堂刻本。

② 曾雄生:《中国农学史(修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81-287页。

③ [美]贾晋珠:《谋利而印:11-17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邱葵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14-315页。

④ 周安邦:《明代日用类书〈农桑门〉中收录的农耕竹枝词初探》,《兴大中文学报》36期,2014年12月;周安邦:《由明代日用类书〈农桑门〉中收录的蚕桑竹枝词探究吴中地区的蚕业活动》,《兴大人文学报》55期,2015年9月。

⑤ [元]熊宗立:《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全十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119-129页。

南方水生植物的种植方法,篠田统猜测可能是因为《居家必用》为北方人所撰,而刘基(他认为刘基是《多能鄙事》的撰者)则出生于浙江东南的青田,因为两书撰者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所以他们笔下载记的蔬果品种自然也就有所不同^①。该发现颇为有趣,由于《多能鄙事》多为对《居家必用》的抄袭,所以书中叙述的知识大多还是反映元代而非明代的社会情境,仅仅因为该书是在南方地区刻印的,所以撰者针对其中的蔬菜与水果篇做了些许调整,以满足当地读者的需求,但毫无疑问该书还是与明代后期由建阳书坊所刻的日用类书在知识结构上有很大差异,仅仅是宋元日用类书向晚明建阳日用类书过渡的一个中间版本。

晚明日用类书中的农桑知识体现在其“农桑门”中,据笔者统计,现今可见的晚明日用类书中至少有11部中有“农桑门”,其中除万历三十五年潭阳熊氏种德堂所刊《新刊翰苑广记补订四民捷用学海群玉》中的“农桑门”只存目录,原文已经佚失外,其它10部日用类书都有关于“农桑门”的完整篇章^②,它们按照刊刻时间的大致先后顺序分别为:万历二十五年书林闽建云斋所刊的《新镌全补天下四民利用便观五车拔锦》卷28“农桑门”,万历二十七年余氏双峰堂刻本《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卷38“农桑门”,万历书林徐猷可刊本《新镌燕台校正天下通行文林聚宝万卷星罗》卷5“农桑门”,万历三十五年龙阳子辑《鼎镌崇文阁汇纂士民捷用分类学府全编》卷9“农桑门”,万历三十八年积善堂杨钦斋刊本《新刻全补士民备览使用文林汇锦万书渊海》卷25“农桑门”,万历四十年书林刘氏安正堂重刊本《新板增补天下使用文林妙锦万宝全书》卷30“农桑门”,万历四十二年潭邑书林对山熊氏刊本《新刻邺架新裁万宝全书》卷28“耕布门”,万历年间刊刻《新刻增补士民备览万珠聚囊不求人》卷17“农桑门”,明刊本《鼎镌龙头一览学海不求人》中未署卷数的“农桑门”,崇祯十四年刊本《新刻人瑞堂订补全书备考》卷5“农桑门”。这批书籍除了《新刻人瑞堂订补全书备考》为金陵书坊刊刻以外,其他皆为福建的建阳书坊所刻。

在这批日用类书的“农桑门”中,出版商为了节约版面以缩减印刷成本,一般将每页纸张分作上下两栏,两栏内容互相补充与照应。除《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与《人瑞堂订补全书备考》外,其他日用类书皆为上层是题作“农桑本务”“农桑便览”或“耕佈便览”的篇章,主要包括耕获、蚕桑、花果、蔬菜、竹木等各色栽培植物的树艺方法,下层则被称作“农桑撮要”,主要包括农桑耕织图以及每幅图像正下方所附的竹枝词,他们在内容上有相当的重合,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某些便利。《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的“农桑门”则是另一种写作模式,书商将其分为上下两栏的目的似乎仅仅是为了考虑节约印刷成本,两栏之间没有任何对应关系,上栏主要是蚕桑知识以及果蔬、花卉等作物的种植技术,下栏主要是对大田作物栽培的各种具体技术环节的概述,其主要内容包括木刻耕夫织妇赞、农事源流、蚕事源流、蚕缫捷要、井田篇、牛耕篇、农器篇、耕犁篇、耙劳篇、种植类、百谷篇、开垦篇、锄治篇、粪壤篇、灌溉篇与收获篇。《人瑞堂订补全书备考》的“农桑门”虽然在书的目录页中标注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是劝农歌诀与劝桑歌诀,下层为名公绘图与农桑捷览,但实际上在该部分看不出明显的分层痕迹,因为它不像书中的其他章节那样有明显的分栏线。该章上层是农业竹枝词,下层为耕织图像,所以该书的整篇“农桑门”仅相当于其它含有“农桑门”章节日用类书中的耕织图词部分(即下栏)而已,而本文我们要研究的农桑知识部分则阙如。根据书商与撰者的编纂体例,我们可将晚明日用类书“农桑门”中的农桑知识大致分为以稻作为中心的作物耕获知识、植桑养蚕知识、果树与花卉栽培知识、蔬菜种植知识以及农业耕织图词这五种类型,鉴于农业耕织图词部分篇幅较大,我们将另撰文对其进行探讨,本文中,我们将聚焦于“农桑门”上栏中的文本知识,即其中署作“农桑本务”“农桑便览”或“耕佈便览”的篇章。

① [日]篠田统:《中国食物史研究》,高桂林、薛来运等译,中国商业出版社,1987年,第165页。

② 在万历四十二年潭邑书林对山熊氏刊本《新刻邺架新裁万宝全书》中,编者将含有农桑知识的章节称作“耕布门”,顾名思义,耕为耕作,布为纺织,与“农桑门”具有相同的含义。

二、晚明日用类书中农桑知识的内容及其价值

晚明日用类书中农桑知识的开篇与核心是以稻作为中心的作物耕获知识。宋之前,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在整个农业体系中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农书典籍中论述的也主要是北方的农业技术,以至于直到晚明宋应星还因为“五谷”概念中没有水稻而耿耿于怀,将其归咎于“著书圣贤起自西北”^①。虽然南宋陈旉撰写的《农书》专辟三卷来讨论南方地区的水田农业,重点阐述水稻育秧移栽与田间管理技术,但该书在当时的影响颇为有限。

伴随着宋元的易代,农书撰写又回到了南北结合但偏重于北方的传统中,这种地域偏好趋势在元代编纂的三部农书中即可看出,水稻在《农桑辑要》中被放置在粟与麦之后,且其中的水田耕作知识都是对先前文献《汜胜之书》《齐民要术》与《四民月令》相关章节的全盘抄袭;《农桑衣食撮要》里涉及水稻的只有“犁秧田”“浸稻种”“插稻秧”“壅田”和“耘稻”寥寥五条,对于水稻的收获过程只字未谈,而书中关于旱地作物粟的收藏和保存则有详细的技术指导性说明;尽管王祯在其《农桑通诀》中对南北方的水田与旱田皆有叙述,他本人也对水稻赞不绝口,认为它是“谷之美种”,但在《百谷谱》中,他还是将水稻放在粟的后面。早期日用类书的编纂也都遵循了类似的传统,《事林广记》的撰者及其在元代的增补者们都没有谈到水稻的种植,而书中关于大麦、小麦、豆等其他旱地作物皆有专门的条目来叙述其种植方法,在元代《居家必用》和它的明代衍生品《多能鄙事》中仍是如此。弘治年间邝璠编纂《便民图纂》时这种偏重旱地农业的写作方式得到了改变,邝氏根据彼时江南地区的农业实际状况将水稻置于作物体系的绝对核心,详述了从秧田整理到收获储藏的水稻生产全过程。

晚明日用类书的生产刊刻绝大多数在福建建阳,其销售区域集中在以江南地区为核心的南方地区,水稻生产在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中占据主导性地位,所以日用类书的撰者在编纂“农桑门”的过程中,也仿效了邝璠的写法,将水稻置于粮食作物的首位,着重阐述水稻生产的整个技术过程。江南地区的早稻一般在寒露前收获,晚稻则要霜降后,“农桑门”部分的“割稻之图”中所配竹枝词皆曰“光阴似箭冬又逢”,描绘的正是收割晚稻的场景,可能表明该时期江南和福建地区种植的水稻品种多以晚稻为主。该部分在农学知识上颇有创见,如稻种选择的方法是“常岁别收,选好穗纯色者,晒干,拣去莠稗,筛簸净,用稻草包裹,每包二斗五升或三斗,高悬屋梁,以防鼠耗,每亩计谷一斗,然种必多留,以备阙用”,该技术是对先前旱地作物留种和稻种储存两种技术的融合。贾思勰在谈论粟、黍、稷、粱等旱地作物收种方法时候倡导要“常岁岁别收,选好穗纯色者”^②,即通过穗选法来选取性状稳定的良种,但选好的种子直接“剡刈高悬之”即可,但在卑湿多雨的南方地区需要对种子做更进一步的处理,王祯提及稻种要“晒干,蓐藏,置高爽处”^③,而日用类书中用稻草包裹和高悬屋梁即是对两种先前技术的融合。

除水稻外,南方地区也会有一定面积旱地作物的种植,特别是随着以稻麦二熟为代表的轮作、多熟制度的进一步推广与普及,旱地作物在南方地区的农业中的作用变得愈发重要,日用类书的“农桑门”中共有大豆、小豆、绿豆、小麦、大麦等十余种旱地作物的种植方法。虽然这部分知识大都袭自《便民图纂》,但撰者将它们顺序进行了重新调整,从中亦能看出晚明江南地区作物种植规模与地位的一些变化。譬如豆类作物被放置在最重要的位置,可能是这个时期豆饼被视作一种重要的肥料应用在江南农业实践中的重要体现。

养蚕缫丝是晚明江南地区农家主要经济来源之一,当地农民多借助蚕桑业来“以织助耕”。蚕桑是

① [明]宋应星著,潘吉星译注:《天工开物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6页。

② [北魏]贾思勰原著,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第二版)》,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第54页。

③ [元]王祯撰,缪启愉、缪桂龙译注:《东鲁王氏农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8页。

日用类书中农桑知识的第二类,撰者将其称作“蚕桑类”,主要包括桑树栽培管理和养蚕缫丝两方面。桑叶是蚕的口粮,桑树种植为养蚕业提供了基本物质保障。日用类书中的桑树栽培管理技术颇为先进,尤其体现在对桑树植株的管理上,修桑与斫桑可使桑树形成良好树型,从而提高桑叶的质量,日用类书中对此技术也做了诸多叙述,如书中提及修桑的方法是“削去枯枝及低小乱枝条,根旁掘开,用粪土培壅,八月正月皆宜,若不修理,则叶生迟而薄”。斫桑活动一般在五月间进行,不可留鬐角,斫桑后为了让桑树迅速恢复生长,必须及时补充肥料,即“夏至开掘根下,用粪或蚕沙培壅”,同时代的沈氏将修剪后的施肥叫做“谢桑”,并说“谢桑尤是要紧工夫,切不可因循”^①。明代农民通过长期对桑树的精心修剪和造型,使得桑树的枝干高度有了明显矮化,改变了之前摘桑叶需要借助桑几、桑梯等工具的做法,宋应星对此有过论述:“欲叶便剪摘,则树至七、八尺即斩截当顶,叶则可婆婆可扳伐,不必乘梯缘木也”^②,这极大地便捷了桑园的管理。日用类书中的“采桑之图”由于受到南宋楼璩耕织图中绘画的影响,还是绘制着男子踩着桑梯在摘取桑叶的情景,这是日用类书撰者囿于依赖经典文本而导致农桑知识陈旧的一处证据。

日用类书中的养蚕缫丝技术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对从收蚕种到择茧、缫丝等一系列技术过程的分步骤叙述,该部分主要是受到楼璩耕织图中“织部”耕织图像与技术步骤的影响;二是对先前文献中总结的养蚕经验进行系统记录,这些经验散见于宋金元时代的诸种农书与蚕书中,经过大司农司《农桑辑要》的编纂而得到综合,是对古代养蚕知识的一种理论化尝试。日用类书中提及养蚕时要在腊月八日当天用洗浴的方法来对蚕种进行处理,浴蚕可以用桑柴灰或稻草灰,草木灰属于碱性,用此种方法处理蚕种可对其进行消毒,这比金元时期农书中记载的用井水来浴蚕的方法更为先进,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道:“凡蚕用浴法,唯嘉、湖二郡”^③,可见日用类书中提及的先进浴连方法是嘉湖平原的独特技术,这也间接佐证了晚明时期日用类书的主要销售市场是以嘉湖地区为中心的江南。

晚明日用类书“农桑门”中的第三类知识是花卉与水果的种艺方法,被撰者冠以“种花果类”的名称,这部分知识又可分作四类:一是各种果木的种植方法,包括桃、李、杏等。其中藕、菱、鸡头、荸荠、茨菰等水生植物也附在水果篇可能使读者感到奇怪,但在明代人的观念里,这些水生作物的果实确实被视作水果,含义可能是水里生长的果子,如《多能鄙事》中“种水果法”篇下的二级条目即是“种藕”与“种菱茨”^④;西瓜在《农桑辑要》中被划归到“瓜菜”类,在王祯的分类体系中也划入“蔬属”,但作为一种甘甜多汁的水果,它与其他种类水果的关系显然要比与蔬菜的关系更加密切,所以也被日用类书撰者放入有关果的篇章,大约在同时期的《汝南圃史》中,西瓜也被放入“水果部”,可见在明代后期,西瓜已经不再被人们视作蔬菜而是水果的一种。二是各种花卉的栽培技艺与方法,晚明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花卉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形成了许多专业化的生产区域。文震亨在《长物志》中提到“第繁花杂木,宜以亩计”^⑤,玫瑰“吴中有以亩计者,花时获利甚夥”^⑥,茉莉“花时,千艘俱集虎丘,故花市初夏最盛”^⑦,侧面可见当时江南花卉产业的兴盛。受土人审美的影响,将花卉折枝后放入瓶中观赏的插花技艺在晚明十分流行,当时有《瓶史》《瓶花史》等多部著作来专门讨论瓶中花卉的保存技术,日用类书中所载的“养花法”即是关于这一问题的叙述,撰者云将牡丹、芍药等“先烧枝断处,镕蜡封之”,嗣后插入瓶中可保持花朵数日不萎。三是各种经济林木的种植技术,如书中记载的椒树是当时的一种重要经济林木,虽然晚明时辣椒已经传入我国,但它在当时仅被视作一种观赏性植物而未用于饮食,当时的饮食调味主要还是靠花椒。晚明时,

① [清]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释,王达参校、增订:《补农书校释(增订本)》,农业出版社,1983年,第57页。

② [明]宋应星著,潘吉星译注:《天工开物译注》,第93页。

③ [明]宋应星著,潘吉星译注:《天工开物译注》,第88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室:《明代通俗日用类书集刊》,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90页。

⑤ [明]文震亨著,李霞、王刚编著:《长物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42页。

⑥ [明]文震亨著,李霞、王刚编著:《长物志》,第64页。

⑦ [明]文震亨著,李霞、王刚编著:《长物志》,第82页。

花椒被视作一种重要的调味品,周文华就曾提及江南地区:“五六月摘青椒,入盐梅及酱瓜内,最有风味”^①,所以日用类书将椒树与茶树等经济林木并列,以凸显它的重要经济价值。四是对诸类花果植物种植过程中一些通论性或关键性技术的单独性阐述。毕竟当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居人口的增长,人们对新鲜果蔬和花卉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加,栽植这些园艺作物获利要远远大于种植粮食作物,在这种情况下园艺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已冲破了自给自足或仅仅被视作“上以助百谷之缺,下以补诸物之遗”^②的藩篱,成为当时农业中一个独立出来具有显著商品经济特征的部门,所以对其种植技术也就更为关注。

晚明日用类书“农桑门”中的第四类知识是关于各类蔬菜的种植法,这部分被撰者冠以“种诸色蔬菜”之名。蔬菜历来是中国人的主要食物来源之一,在古代就有“菜不熟曰谨”的说法。明代中后期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江南某些地区的蔬菜种植已突破了自给自足的范围,出现了专门生产蔬菜以供给城市居民的种菜业,如苏州府的吴江在弘治年间已“居民皆业圃种蔬,远近取给,每晨钟初静,黄童白叟累累然数百担入城变易,皆土产也”^③。日用类书的编纂者们关于蔬菜种植部分的知识皆是摘取自《便民图纂》,邝璠在《便民图纂》的“种诸色蔬菜”篇内共记载了36种蔬菜的种植方法,日用类书的编纂者皆从中选取一些切合庶民日用的部分抄入自己的书中,从他们对蔬菜种类的取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窥视晚明时期栽培蔬菜种类在江南地区的消长变化。首先是某些药用植物从蔬菜类中被淘汰出去,譬如紫苏、薄荷与山药;其次是茼蒿、茼蒿、王瓜、酱瓜、生瓜、葱、韭、蒜等蔬菜也被剔除出去,可能是因为这些蔬菜要么变得不再重要,要么是以在北方种植为主。该部分记载的蔬菜种类具有极强的地方性色彩,譬如姜和茄子是南方地区的两种主要蔬菜,它们吃法甚多,在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姜“早采,剥白,醋食极鲜。或酱食,可接新。老姜和羹,能解腥气”^④,茄子“作羹,或烧煮充素馔,或腌,或醋,或酱,或糟,或取小者浸芥辣,食俱佳”^⑤,另外由于姜能够长时间保存,适宜于长途贩运销往他处,所以也是一种重要的经济类作物,在晚明江南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养羊种姜,子利相当”^⑥,可见其收入之厚。日用类书中记载种茄子的方法是二月份下种,三月间移栽,要注意稀种并需时常施肥。姜在三月份种植,以蚕沙、腐草或灰粪来覆盖,夏天天热时要搭棚以蔽烈日,冬天要将其裹上糠秕放在地窖中来存种。

三、辑要、撮要与晚明农学概念的转变

邝璠任吴县令时,为了劝课农桑,在参考各类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的农业实践,编纂了一本名曰《便民图纂》的农书,由于该书是以江南稻作农业体系为中心,且在果树种植、蔬菜培植以及饮食民俗等方面皆有鲜明的江南地域烙印。作为刊印于福建建阳且以江南地区为主要销售市场的日用类书来说,《便民图纂》中的农业知识为它提供了极佳的范本,所以日用类书的编纂者们在编写“农桑门”时都会认真参考该书中“耕获类”“蚕桑类”和“树艺类”部分的农业知识,挑选出他们认为实用且畅销的一些知识放入到“农桑门”中。但在谈及“农桑门”的知识来源时,编纂者们却对《便民图纂》只字不提,而是声称他们的农桑知识来自于另一本农书:

大元诏立大司农司,不治他事,而专以劝课农桑为务,又虑夫田里之人未知播植之宜、蚕桑

① [明]周文华著,赵广升点校:《汝南圃史》,凤凰出版社,2017年,第169页。

② [元]王祯撰,缪启愉、缪桂龙译注:《东鲁王氏农书译注》,第137页。

③ [明]莫旦纂:《吴江志》卷2《市镇》,明弘治元年刊本。

④ [明]周文华著,赵广升点校:《汝南圃史》,第175页。

⑤ [明]周文华著,赵广升点校:《汝南圃史》,第170页。

⑥ [明]周文华著,赵广升点校:《汝南圃史》,第175页。

之节,于是颁行一书,名曰《农桑辑要》,使天下之民读其书而得其术,则用力寡而获利倍,诚斯民衣食之源也,今撮其要中之至要者列于左。^①

这里虽然可将其视作是书商的一种销售伎俩,因为日用类书的编纂者多是籍籍无名的落第文人,他们为了宣称自己所编书中知识的正统性或权威性,经常以托伪该书是名人所撰,如《多能鄙事》被包装成刘基所撰,晚明诸种日用类书皆被托伪到陈继儒名下,就是这种风气的一个体现。《农桑辑要》是由元代专门负责劝课农桑的中央机构大司农司主持编写,由孟祺、张文谦、畅师文等人编纂,在民间影响甚大,《便民图纂》则相形见绌,仅为一名普通县令所撰。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是日用类书这类书籍本身的一个特色,《事林广记》的元刻本中就撰有该段言论,由于《农桑辑要》是元代日用类书编纂者能看到的最新版权权威性农书,所以日用类书中的农学知识多摘自该书,时过境迁,虽然元代日用类书“农桑类”中的具体农业知识由于过于陈旧而无法直接照搬到晚明新纂的日用类书中,但是这段置于开头彰显其知识权威性的话语却被撰者们照搬了下来。

再退一步来说,即使元代刊刻的标榜着其知识来自《农桑辑要》的日用类书,其农学知识的实际来源也甚为庞杂,它其中的某些知识来自于前代日用类书,某些知识来自于《王祯农书》,某些关于种植吉凶的知识还可能来自于民间,而《农桑辑要》中的知识虽然也有一部分被抄入日用类书,但与具体知识相比,它的编纂体例与方法对日用类书影响更大。虽然中国古代是男耕女织的社会,人们也很早就将稼穡与蚕桑视作传统农业的两个核心,《汉书·艺文志》里就提及农家者流的主要任务是“播百谷,劝耕桑”^②,但直到宋元时期人们才将“农桑”二字来广泛代指农业生产并第一次将其用于书名或篇章名中,所以宋代的《分门琐碎录》中出现了关于“农桑”为名的篇章,元代甚至出现了名为《农桑辑要》以及《农桑衣食撮要》的农书,而日用类书中的“农桑类”或“农桑门”的名称或许就与此潮流相关。《农桑辑要》的特点之一即是其知识的条理化,它是在撰者“遍求古今所有农家之书,批阅参考,删其繁重,摭其切要”^③的基础上编纂而成,四库馆臣称其“大致以《齐民要术》为蓝本,芟除其浮文琐事,而杂採他书以附益之,详而不芜,简而有要,于农家之中最为善本”^④,而《农桑衣食撮要》则在其基础上又做了两处重要的改变,第一是在《农桑辑要》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删除农学知识的引用之来源,直接叙述其技术要点;二是它以月令体裁为纲,仅选取与农家生活息息相关的部分,使“黄童白叟,日用不知,一览瞭然也”^⑤,即它仅关注农业知识部分,即所谓的“要”,对历代农书中出现的农本、典训等非农业知识的篇章则阙而不录,这点对晚明日用类书的编纂具有重要的影响。宋元时期日用类书中农桑篇章的主要读者是读书人,这一点从相关书籍的编排目录中即可看出,如《居家必用》中的“戊集”明明名曰“农桑类”,却附以“文房适用”“宝货辨疑”等读书人或士人阶层所关注的东西。这种情况也体现在其知识的书写上,如元刊《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的“花果类”中,撰者在论及牡丹时就长篇累牍引用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中的内容,在论述芍药时就抄袭刘敞的《芍药谱》,其诗学特性完全胜于农学,而晚明日用类书中提及牡丹和芍药时仅仅记载其种植方法,这种简洁化的转变明显受到元代两部农书的影响,也体现了农学知识的转变以及背后目标读者的改变,即日用类书的受众从以“多识”为主要目标的博物士人^⑥转变为农桑知识的关注者和直接从业者。

虽然之前鲜有学者关注到“农桑门”中的农学知识,仅有的关注也只是对其中所载的农业竹枝词进

① 这段文字为《学海不求人》“农桑门”上栏的开端文字,名曰“农桑总说”,在《天下便用文林妙锦万宝全书》中“农桑门”开篇,也有类似一段文字,题曰“农桑本务”。

②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30《艺文志第十》,中华书局,1962年,第1743页。

③ 石声汉校注,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整理:《农桑辑要校注》,中华书局,2014年,《〈农桑辑要〉原序》第1页。

④ [元]司农司撰:《四库全书·农家类·农桑辑要》,中国书店,2018年,第21页。

⑤ [元]鲁明善著,王毓瑚校注:《农桑衣食撮要》,农业出版社,1962年,第17页。

⑥ 元刊《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的牌记中提到目标读者是“博物洽闻之士”。

行的简单解读,但某些关注日用类书中其他门类知识的学者在其研究中也会提及农业知识,如王正华在研究晚明日用类书中“书画门”时就注意到晚明日用类书中的农学知识与前代日用类书中记载的有所不同,她据此认为这是晚明日用类书中农业知识萎缩的一个标志:

晚明日用类书在“正统知识”上颇见削减,尤其是与儒教、幼蒙或农业有关的部分。……传统的农业知识只剩农桑部分,删去花果、竹木、兽畜等,可见《事林广记》关照的是农业生活的整体,而晚明日用类书仅取基本,在所包括的知识范围中存其一格。^①

其实这种依据知识篇幅的多少得出的直观看法是片面的,它忽略了南宋到晚明这段时期内农业一词在概念上所发生的变化。在中国古代特别是明代以前,农业或农学一词概念的外延相对比较狭窄,《汉书·食货志》对农业的定义是“辟土殖谷曰农”^②;贾思勰在说到《齐民要术》的写作范围时谈及该书:“起自耕农,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舍本逐末,贤哲所非;日富岁贫,饥寒之渐,故商贾之事,阙而不录。花草之流,可以悦目,徒有春花,而无秋实,匹诸浮伪,盖不足存”^③;直至宋代,欧阳修还狭隘地认为“农家者流,衣食之本原也”,而农学著作也仅被视作“树艺之学”^④。

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农业仅被视作种植农作物的行业,其他如果树栽培、花卉种植、畜牧兽医等门类都被压缩甚至直接被排除在外,所以宋代温革所撰的《分门琐碎录》虽被学者归为农书类,但它其中的农业知识却被分为农桑、种艺、禽兽、虫鱼、牧养、饮食等诸类不同的篇章,而成书于南宋的《事林广记》中涉及农业的篇章也有“农桑类”“花果类”“竹木类”与“牧养类”四部分。但在晚明时,随着市民经济的蓬勃兴起和农业商品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农业一词的概念有了很大的变化。先前被视作“徒有春花,而无秋实”的花卉种植和果树栽培及近城蔬菜培壅都已形成了专门的行业,获利也远超于种植粮食作物,所以这些先前不被视作农业的部分都被划入到“农桑门”中;先前宋元日用类书中的“农桑类”在晚明日用类书中被称为“耕获类”和“蚕桑类”;“花果类”和“竹木类”被放入“树艺类”中;而“牧养类”则在某些情况下被单列出来称作“牧养门”。所以总体来看,相较于宋元时的日用类书,晚明日用类书中的农学知识非但没有萎缩,反而内容变得更为丰富,且更具条理化与技术性,或许真正能起到“农以之耕,知天时亦知地利”^⑤的效果。

[参 考 文 献]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室. 明代通俗日用类书集刊[M].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 [2] 王毓瑚. 中国农学书录[M]. 北京:农业出版社,1964.
- [3] 缪启愉. 齐民要术校释(第二版)[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
- [4] 缪启愉,缪桂龙. 东鲁王氏农书译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5] 石声汉. 农桑辑要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14.
- [6] 潘吉星. 天工开物译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① 王正华:《生活、知识与文化商品:晚明福建版“日用类书”与其书画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1期,2003年9月。

②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24上《食货志第四上》,第1118页。

③ [北魏]贾思勰原著,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第二版)》,第19页。

④ [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124《崇文总目叙释一卷·农家类》,中华书局,2001年,第1893页。

⑤ [明]武埭子:《新刊翰苑广记补订四民捷用学海群玉》序言,明熊冲宇种德堂刻本。